

# 域出版：新媒體時代學術傳播的新嘗試

原祖傑

隨著媒體的交疊更替，學術傳播也正在醞釀著一次重大轉型。三個半世紀前，由於科學革命的推動和紙張、印刷以及圖書裝訂等一系列技術的成熟，讓定期出版學術期刊成爲可能。1665 年在巴黎和倫敦先後出現了兩份學術期刊，即《學者雜誌》和《皇家學會哲學會刊》，從此開啓了學術傳播的紙質期刊時代。經過三個半世紀的發展，尤其是在 19 世紀現代學科劃分被廣泛接受以後，學術期刊從形式到內容都日臻完善，成爲學術發表最爲重要的載體。然而，隨著信息革命的爆發、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和不同形式的新媒體的出現，人們接受信息的方式已經發生巨大轉變，學者們的閱讀習慣、寫作習慣以及從事科學研究的習慣也在潛移默化中向新媒體靠近，紙質期刊的原有功能不斷被削弱，讓期刊人首先感受到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彷徨不安。學術發表向何處去？學術期刊的出路何在？成爲廣大期刊人普遍關注的問題。近來，期刊界的改革者們與超星集團合作，推出一個新理念——域出版。作爲一種新嘗試，域出版能否帶來新媒體時代學術傳播的革命，是中國期刊界乃至廣大學者都十分關注的問題。然其成敗所繫何處，則是合作方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毋庸諱言，中國的任何局部改革都繞不過現有體制，各級管理部門的支持和鼓勵將是這次改革成功的基本保證。對於體制和政策因素在期刊改革方面的作用，朱劍、仲偉民等期刊改革的領導者們都曾撰文剖析，在此不再贅述。除了體制和政策因素之外，決定其成敗的至少還有兩個相互關聯的因素：其一是域出版作爲一種傳播理念是否符合學術傳播的一般規律，作爲一種新的學術傳播嘗試是否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學者的需要；其二是域出版是否能夠獲得足夠的技術支持，引領新媒體時代學術傳播的未來走向。本文圍繞這兩個因素略述管見，以就教於方家。

## 一、傳統學術期刊在學術傳播上具備哪些功能

在上世紀後半期互聯網在傳播領域開始攻城略地之前，經歷數百年發展的紙質學術期刊已經臻於成熟，其功能基本可以滿足研究者的各種需要。要瞭解學術傳播的一般規律，首先要瞭解學術期刊在其發展歷程中形成了哪些不可或缺的功能。我曾經在一篇小文中專門討論了學術期刊的對話與交流功能（《澳門理工學報》2016 年第 2 期）。應該說，定期出版的紙質學術期刊在讓學術交流規範化的同時，也限制了期刊出現之前學者之間通信交流所具有的靈活性，相信互聯網時代能夠爲學者之間的對話與交流提供更方便的條件。除了交流功能之外，學術期刊還具有展示功能，作者可以以此爲平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見解，展示自己的發明創造和聰明才智。相對於之前讀者範圍極爲有限的書信，學術期刊可以同時將作品傳遞給無數的讀者，讓作爲發現者或發明者的作者可以一夜成名。我們不否認很多學者以學術進步爲志業，以學術貢獻爲己任，但獲得業內同行的認可幾乎是學術共同體每個成員的期望。正因爲如此，我在上述小文中將交流與展示作

為學術期刊的兩個基本功能，但這並不否認學術期刊還有其他功能的存在。

學術期刊的第三種功能是其記錄功能。在靠通信進行學術交流的時代，科學家們經常因為某種發明和發現的時間先後引發著作權和發明權之爭。學術期刊出現後，作為一個公共平台能夠較為準確、公正地記錄投稿時間，判斷發明的先後，從而解決了知識產權的歸屬問題。此外，紙質期刊能夠得到永久保存也增強了其記錄功能，給發表者提供了足夠的安全感。

學術期刊的第四種功能是其評價功能。因刊評文的習俗一直廣受詬病，但長期以來卻行之有效，除了它為學術管理帶來了便捷之外，更重要的還在於期刊的品牌影響已經深入人心。期望自己的作品發表在業界名刊幾乎是每個研究者的心願，即使大牌學者也不能免俗。而紙質期刊的分層與多樣也恰好為不同層次的研究者們提供了與其水平大致相當的發表平台。當然例外總會有的，讓作者榮獲諾貝爾獎的文章有時也會出自名不見經傳的小刊，很多普通期刊也經常通過名人稿件強化其名人效應以提高自己的聲譽。但總體來說，期刊界還是能夠維持一種相對穩定的秩序，為學術評價和學術管理提供較為可靠的參考。

另外，紙質學術期刊還能夠按照一定的發表周期匯聚相關領域的學術文章，讓研究者通過訂閱自己領域的期刊可以方便地瞭解前沿性學術動態。也就在十多年前，很多歐美學者的生活中還少不了兩種訂閱：訂閱學術期刊以瞭解學術界的新發現；訂閱時事報刊以瞭解世界上的新事物。茶餘飯後翻開一本期刊，閱讀一篇業內同行的文章，讓有價值的發現和觀點成為他們自己研究和寫作的參考，是很多歐美學者的生活常態。然而，這種延續數百年的生活常態在新媒體時代被迅速打破，紙質期刊從此風光不再。

## 二、新媒體時代學術傳播的優勢與局限

新媒體衝擊紙媒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快捷。微博、微信等傳播方式都側重在一個“微”字，走得是短頻快的輕靈路子，與學術論文的厚重、繁複相比，它們給讀者提供的多是快餐式閱讀，讀者可以在短時間內獲得一條完整的信息。二是方便。微信、微博現在大多通過手機終端傳送信息，讀者可以在茶餘飯後或旅行途中方便地閱讀，比過去的紙質報刊更方便攜帶和查找。三是及時。新媒體打破了過去紙質刊以期為單元的發佈方式，可以隨時發佈，隨時獲取，學術信息的傳遞已經接近於即時報道。正是因為具備這些優勢，借助新媒體的學術傳播才受到廣泛關注。但是，與經過數世紀積澱、完善的紙質學術期刊相比，新媒體在學術傳播方面也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茲列舉如下：

一是其可信度問題。傳統紙質期刊不僅可以永久保存，而且多數期刊會非常重視自己賴以生存的學術信譽。然而，進入新媒體時代後，讀者往往是通過搜索引擎從數據庫中找出單篇文章來閱讀，學術期刊的獨立性連同其學術信譽可能逐漸被淡化而最終消失。不僅如此，由於數字版文件可能隨時被刪除，發佈平台也可能隨時被關閉，其存在和保全的穩定性自然影響到其可信度和對學術發現的記錄功能。

二是規範性問題。現在很多數字化的文件往往未經認真編輯就公開發佈，微博、微信中傳播的文件尤其如此，包括很多學術發佈在內，錯漏失誤比比皆是。發佈者為了追求時效性而不再顧忌紙質文件齊、清、定的格式要求，也不會像紙質學術文章那樣要經過三審三校等嚴格的編輯程序，更不會提供準確、詳細的文獻徵引，數百年形成的傳統學術傳播的嚴肅性和規範性將會大打折扣。

三是文件長度問題。學術文章的長度也是由學術研究的一般規律決定的。從目前的學術發表狀況看，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術文章長度一般在 6,000 字以上，因為在這些領域，要說清楚一個嚴肅的問題，非這樣的長度難以奏效。近年來中國學術期刊的文章長度還有不斷增加的趨勢，很多文章發到五六萬甚至十幾萬字。但這樣長的文章顯然不適合手機閱讀，即使不考慮視力損害等健康因素，手機閱讀文件的長度也應限制在 5,000 字以內，也就是讓讀者能夠一口氣讀完，而不必分成幾個時間段來閱讀一篇文獻。這樣看來，具備完整信息的學術文章並不適合在手機上閱讀，更不用說標記、引用了。這或許就是很多學者一直對紙本閱讀戀戀不捨的原因之一。

最後是學術管理是否方便的問題。目前中國大學的學術管理工作紛紜複雜，科研管理部門為了追求管理上的方便不得不通過劃分期刊等級來確定文章的水平，這就造成廣受詬病的以刊評文問題。中國學術界往往將以刊評文視為高校學術管理體制的弊端，豈不知這種做法在歐美很多大學也普遍存在，只不過對期刊的評判權一直掌握在學科領域內同行專家的手中，學術期刊的等級差別存在於學者的心目中，而不是科研管理機構的表格裡。中國學術管理的問題主要是將這種評判官僚化、簡單化了，脫離了學術共同體的制約。客觀來說，中國大學在面對不斷刷新記錄的學術產量面前採用分級管理的機械化作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一旦期刊格局被打破，固有的學術評價體系也就失去依託，必然為科研管理工作製造新的難題。當然，舊的學術評價體系的傾覆未必是壞事，很可能為學術評價回歸學術共同體創造契機，而域出版的出現將引領學術秩序的重建和學術生態的根本改善。

### 三、域出版的優勢所在

朱劍在其《構建互聯網時代學術傳播的新秩序》一文中指出，專域平台將成為“通往學術傳播新秩序之路”，因為這一設計首先是基於兩方面考慮，一是要推動學術體制朝著“尊重學術研究和學術期刊以及學術新媒體的發展規律”的方向發展，“盡可能地滿足學術研究的需要”；二是“通過技術手段讓平台實質上回歸學術共同體”。以此為出發點勾勒出具有“開放”、“互動”、“協同”、“質量”、“規範”、“服務”和“評價”等特徵與功能的“超雲”平台（《武漢大學學報》2016 年第 2 期）。最近，超星團隊已經初步設計出以“域出版”為核心的在線學術出版平台，向學術傳播的新時代邁出了重要一步。從現有的設計和超星集團的開發基礎來看，域出版具備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

在總體思路上，域出版既要打破紙媒時代的“期刊”局限和學科壁壘，同時又要避免網絡信息時代數據庫過大造成的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局面，最大限度地滿足學者的科研需求。桑海在其《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在線學術平台》一文中從作者和讀者實際需求的角度闡述了未來在線學術平台的構想，將學者需求作為未來在線學術出版的方向（《南京大學學報》2015 年第 3 期）。學者的科研需求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需求應不外乎兩類：其一是從事學術研究所需要的資訊。對於從事文、史、哲等人文領域研究的學者來說，這些資訊可能包括某一專域的檔案文獻、學術發表（專著、文章等）、百科辭典、學術經典以及相關的來自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方法和統計資料等等。對於從事政、經、法等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來說，所需的資訊可能包括調查統計數據、時政文件、理論方法以及相關的人文發表中可能提供的文化背景等。這些資訊可以按照需求的強弱劃分等級，讓使用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獲取。超星集團通過與學術期刊合作能夠利用自己原來的圖書情報優勢以專域集成和資源鏈接等方式提供上述資訊，為學者的研究提供更為便捷的服

務。其二是學術同行對自己學術成果的認可、反饋和評價。域出版的目標之一就是讓學術發表回歸學術共同體，這一目標也貫徹到朱劍等人對“超雲”平台的設計構想：六個平台中，至少有三個平台，即審稿平台、互動平台和評價平台的運行離不開專家學者的參與。通過審稿平台學者不僅可以參與控制學術發表的質量和水平，而且可以利用公開評審意見增進交流；互動平台充分利用了多媒體的優勢，讓讀者可以隨時反饋和分享他們的讀後感，實現充分而廣泛的信息和觀點交流；而評價平台旨在通過“學科專家、期刊編輯、讀者群體、評價機構共同參與的開發評價機制”，為建立“公正、公平、公開的學術評價創造條件……讓論文成為學術評價的直接對象”（朱劍：《構建互聯網時代學術傳播的新秩序》，《武漢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

“域出版”是中國期刊界因應新媒體給學術傳播帶來的諸多挑戰而作出的一種新嘗試。從近年來新媒體的發展趨勢看，其所構成的挑戰是全方位的，讓整個資訊傳播領域面臨著是否要重新洗牌的壓力，也讓原來的學術傳播秩序面臨著被徹底顛覆的威脅。首先，它將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原來等級化的期刊秩序，讓期刊品牌淹沒在傳播渠道不斷湧現的信息大潮之中。而“域出版”的平台設計試圖維護學術傳播的期刊本位，讓一部分名刊在增加傳播量的同時不失其品牌效應。其次，它將挑戰原有評價機構在學術評價中的地位，讓學術評價多元化、大眾化。從1960年尤金·加菲爾德創辦科學信息研究所（ISI）並在三年後建立起科學引文索引（SCI）開始，其量化評價標準一直備受質疑；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內地開始參照ISI的做法建立起中文核心期刊評價體系，引發的批評之聲也是不絕於耳。然而，學術發表急劇增加的勢頭從60年代初就已經趨於明朗。根據英國科學史專家德里克·J·戴索拉·普萊斯（Derek J. de Solla）的估計，從1650年到1950年存在的科學雜誌的總數大約是6萬份，而這個數量到世紀末將增加到大約100萬份（Peder Olesen Larsen and Markus von Ins, *The Rate of Growth in Scientific Publication and the Decline in Coverage Provided by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entometrics*, 2010 Sep., 84(3): 575-603），如果把中文在內的所有語言出版的學術期刊都算在內，其總數可能還不只這些。不斷增加的學者人數和學術發表數量讓學術評價不得不依靠量化標準，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學術機構儘管深知量化評價的弊端，卻也不得不採用這些評價機構提供的數據指標的原因所在。而超星設計的新的“域出版”平台，能夠讓讀者直接進行閱讀回饋，從而參與學術評價，為超越量化評價創造了條件。第三，新媒體的發展也將挑戰以學術職稱和學術聲譽為依據的學術權威秩序。曾幾何時，學術秩序的維護依靠的是少數學術權威的一言九鼎。他們以深厚的學術功力和良好的學術聲譽而被民間信賴、官方認可。因此，當人們不滿於學術評價行政化和評價機構反客為主等做法，呼籲讓學術回歸學術共同體時，很多人是在表達對已逝的學術秩序的眷戀。然而新媒體時代已不再有一言九鼎的學術權威，學術民主化甚至民粹化將顛覆學術殿堂莊嚴肅穆的等級秩序，代之以百家爭鳴的學術局面。而“域出版”則試圖通過其審稿、互動和評價平台，讓同行學者在學術評價中佔據主導地位，以此規範新媒體時代的新秩序。

總之，域出版要取得成功，不僅要發揮已有的學術資源和新媒體的優勢，為學者提供更好的資源收集、成果展示與交流反饋平台，還要尊重學術傳播的一般規律，重視傳統學術傳播中學術期刊所具備而今仍然被學者們看重的基本功能，包括優劣區分功能、永久記錄功能、追尋複查功能等等，而這些功能的完善和提高不僅要依靠觀念上的創新，更有賴於技術上的突破。

（作者係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四川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中國歷史學前沿》聯合主編）

[責任編輯 劉澤生]